

引用格式:孟璠磊,杨启帆.工业遗产视角下老工业基地城市单位集体福利设施建筑发展与演变——以咸阳市三个样本为例[J].工业建筑,2026,56(3):77-86. MENG Fanlei, YANG Qifa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in Industrial Living Areas of Old Industrial Cities: Taking Three Samples in Xianyang as an Example: Taking Three Samples in Xianyang as an Example[J].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2026, 56(3): 77-86 (in Chinese). DOI: 10. 3724/j. gyjzG25021002

工业遗产视角下老工业基地城市单位集体福利设施建筑发展与演变*——以咸阳市三个样本为例

孟璠磊 杨启帆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 单位集体福利设施建筑是工业建设时期的特定产物,不仅反映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集体主义思想,也见证了工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与演变,更是工业遗产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研究在回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福利设施发展历程基础上,以咸阳市西北国棉二厂、西北国棉七厂、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生活区福利设施建筑物为样本,通过对其工业生活区的集体福利设施的深入考察,系统梳理了其在计划经济初期、“大跃进”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背景下生活区集体福利设施布局特征,揭示了其从封闭自用 to 开放共享的演变过程。研究为进一步丰富我国工业遗产的价值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也为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中建筑遗存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了历史依据。

关键词 工业遗产;老工业基地;集体福利设施;工业生活区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in Industrial Living Areas of Old Industrial Cities: Taking Three Samples in Xianyang as an Example

MENG Fanlei YANG Qif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are a 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period, not only reflecting the collectivist ideology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but also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e study takes Xianyang 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living area welfare facilities in the era of enterprise-run society in China, the study takes the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of Northwest State Cotton Factory No. 2 (Factory No. 2), Northwest State Cotton Factory No. 7 (Factory No. 7), and Shaanxi Colour Picture Tube Plant (CPT Plant), which were construc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s samples and examines them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planning, layout idea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in the living area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fter which it reveals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closed self-use to open public use. The study provides a historical basis for further enriching the value study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China, and also provides a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high-quality urban renewal.

Key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old industrial base;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industrial living are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资助(23BG139);北京市教委科技计划一般项目资助(KM202310016014)。

第一作者:孟璠磊,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工业资产保护与再利用工作。

电子信箱:mengfanlei@bucea.edu.cn

收稿日期:2025-02-10

过去近二十年是我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工作蓬勃发展时期,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沈阳等一线城市或成都、武汉、西安等新中国八大重点工业城市^[1]。但回顾《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不难发现两个突出特征:1)全国120个老工业城市,除25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外,其余95个均分布于中小规模工业城市,此类工业城市是城市更新与遗产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主要对象;2)老工业基地城市搬迁改造,不只是生产区的改造升级,更包含了工人生活区的治理与更新。因此,关注中小规模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生活区的发展历史与遗产价值,当视为完善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的重要内容而需给予高度重视。陕西咸阳市作为我国最早建成的重要纺织工业基地之一,是众多中小型工业城市的典型代表^[2],先后建成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西北国棉二厂、西北国棉七厂、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分别简称为“二厂”“七厂”“彩虹厂”),其工业生产区和生活区仍保留较为完整,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和还原生活区规划建设中的思想和演变,成为研究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遗产的有效样本(图1)。



图1 1985年3个单位生活区样本在咸阳市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residential area samples from three Danwei in Xianyang City (1985)

围绕工业单位生活区的研究目前国内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工业单位的内涵及其生活区的特点,王乐^[3]认为单位生活区在物质空间层面上具有封闭性、复杂性和混杂无序性的特点;柴彦威等^[4]论述了单位生活区在社会空间层面上形成业缘主导的社会关系,构成职业同质的居住空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二是关注工业单位生活区的发展与变迁,张艳等^[5]基于典型工业企业单位京棉二厂不同历史时期空间的变化过程透视中国城市转型与重构的空间过程;连晓刚^[6]从不同的空间层次出发阐释了单位大院中的空

间形象,并进一步探讨了大院空间在当代北京城中的演变与延续;李晨等^[7]针对单位大院集中地段的道路、街区、地块形态的变迁开展研究。三是讨论工业单位生活区居住空间治理与更新改造,特别是老旧居住小区的整治等。杨江华^[8]提出协同多元主体梳理出治理框架,整合内外资源从而提升生活区质量,吕飞等^[9]提出以“资产为本”激活生活区存量空间,房辉等^[10]首次关注到了单位社区福利设施的主要特征及演变机制,但未深入到空间层面进行社区规划和单位福利设施建筑的具体分析。总体来看,众多学者已较早关注到工业生活区在城市更新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但仍鲜有学者关注到集体福利设施建设对工人生活区规划与布局的影响。但这恰是我国工业建设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1 生活区集体福利设施

1.1 工业生活区

工业生活区是早期大量工人生产生活聚集所形成的聚集形式,早在1888年英国利弗兄弟在利物浦附近建造肥皂厂时就同步建造了房屋800栋,可容纳员工及家属3500人,同时在生活区配备了美术馆、医院、学校、音乐厅及露天游泳池等福利设施建筑物^[11]。这一举措被众多工矿企业所效仿,在同时期进行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和美洲国家,包含有商店、教堂、学校、市场等配套设施的工人生活区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如德国沃尔夫斯堡(Wolfsburg),意大利阿达的克雷斯基(Crespi d'Adda),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镇(Hershey)、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Lowell)。生活区也不只是单纯的居住功能,而是逐渐加入体现人文、健康、休闲等功能附属建筑物,成为工厂招工的重要手段,也是工业企业持续稳定运营的重要保障,甚至逐渐形成“公司镇”(Company Town)等组织形式^[12]。我国工业生活区规划建设也深受洋务运动影响,创建于1917年的天津碱厂在建厂初期就为职员、长工提供综合性的福利事项,包括学校、医疗、住所、图书馆、俱乐部等设施,1925年,天津碱厂还以民族文化为起点,组建国剧、秦腔、武术等业余文体团队,开辟活动场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13],成为早期“企业办社会”的雏形,并逐渐成为普遍做法,有效缓解了紧缺的市场商品与匮乏的社会服务资源所带来的不便。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

务,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单位的福利设施的规划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1.2 单位集体福利设施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成为计划经济初期工业化建设的主要策略,大型工业单位及其生活区配套建设同步展开^[14]。1951年2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保证了工人使用单位福利设施的基本权利,企业承担社会福利体系正式被写入法律^[15-16]。195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工业城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强调单位生活区要同步选址尽早规划,生活区的建设也由单位负责^[17]。上述条例反映出我国早期工业规划已对生活区、福利设施等内容提出要求^[18]。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浪潮,进一步强调了生产与生活结合以及生活集体化,在当时城市基础设施欠缺的情况下,企业单位承担起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向职工提供食堂、医务室、浴室、礼堂、运动场、幼儿园和小学等集体福利设施,“企业办社会”之势逐渐形成。但庞大的福利设施成本投入很快演变为企业负担,1980年住建部(原国家建委)颁布《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强调相关设施不再由工矿企业承担,1993年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更是明确了生活居住区可根据规划结构灵活安排,其配套设施不再依靠工矿企业完成。1995年国家出台《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要求国有企业逐步分离学校、医院、生活区等资产,“企业办社会”的形势逐渐转变。2002年4月,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再次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意见》,学校、医疗、文体等集体福利设施在市场冲击下面临拆分、转让或废弃的局面,“企业办社会”经历了五十年的发展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研究所讨论的单位生活区集体福利设施建设,特指在“企业办社会”过程中,建造的非营利性的建筑物(不含住宅)。具体包括:1)生活服务设施,指用于服务职工日常生活中的文体、餐饮等需求的建筑物,如体育馆、俱乐部、礼堂等室内活动空间及灯光球场、露天剧院等室外活动空间;2)教育福利设施,是指用于服务职工接受技能培训、子女照料及教育的建筑物,如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与职工业余学校等;3)职工医疗卫生设施,是指用于职工及其家属应对工伤、疾病等的医疗服务设施,如卫生所、卫生站、职工医院等(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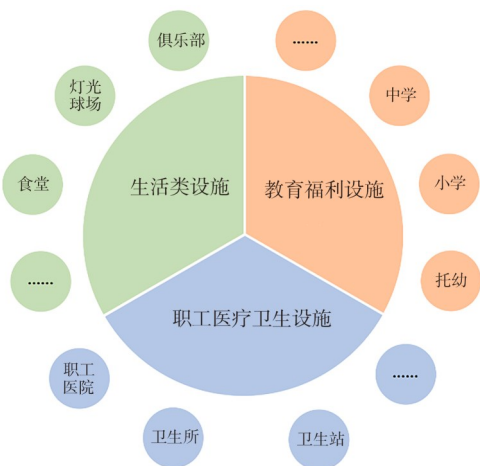


图2 单位生活区集体福利设施空间类型

Fig. 2 Spatial types of collective welfare facilities in Danwei residential areas

从20世纪50年代初西北国棉一、二厂兴建到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咸阳市一直在推动工业化建设,作为与工业重镇西安毗邻的地区,咸阳在纺织工业与新兴电子工业领域的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两大支柱产业中保留着一五时期、二五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3个单位生活区(二厂、七厂及彩虹厂),成为深入研究工业生活区福利设置的重要样本(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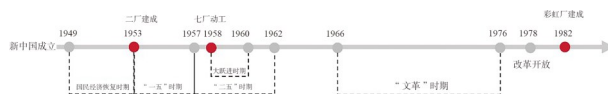


图3 三个单位生活区样本建成时间轴

Fig. 3 Timeline of construction for residential area samples from three compaces

2 样本1:二厂——福利设施区作为生活区的轴线秩序核心

1952—1953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西北国棉一厂、二厂在陕西省咸阳市建成,其生产区和生活区同步规划建设,生活区位于生产区南侧,两者隔路相望。其中二厂生活区位于人民路以南,思源路以西,占地面积约22 hm²,相较一厂生活区福利设施保留更加完整。生活区除工人住宅外,还设置了合作社、招待所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卫生站、职工浴室、子弟学校、托幼、露天运动场等公共集体福利设施,为保障棉纺织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和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2.1 二厂的集体福利设施布局

二厂工业生活区采用网格状布局,与咸阳城市

路网保持一致,在北侧设置两个出入口,两条南北向道路将居住区划分为不同片区。从其平面布局中可以发现,以党工团办公室为核心的行政建筑处于整个生活区核心位置,招待所、合作社、职工浴室和露天广场等分列轴线左右,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近似对称的公共服务轴线(图4)。由于整体生活区采取院墙围合,封闭性较强,人员出入一般仅通过与生产区相对的北侧两个出入口,因此,由若干福利设施所组成的建筑组团成为衔接生产区和生活区的重要纽带。而党工团办公楼设置在生活区并统领整个片区,反证出生产区向生活区的延伸和统治力,也从侧面体现了计划经济初期“生产优先”的总体思想。党工团办公楼左右设置合作社、招待所等公共对外服务功能,形成对外接待功能区。以子弟学校、职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福利设施则布置于生活区北侧界面,与城市干道人民路相接,职工医疗卫生设施则深入生活区,且相对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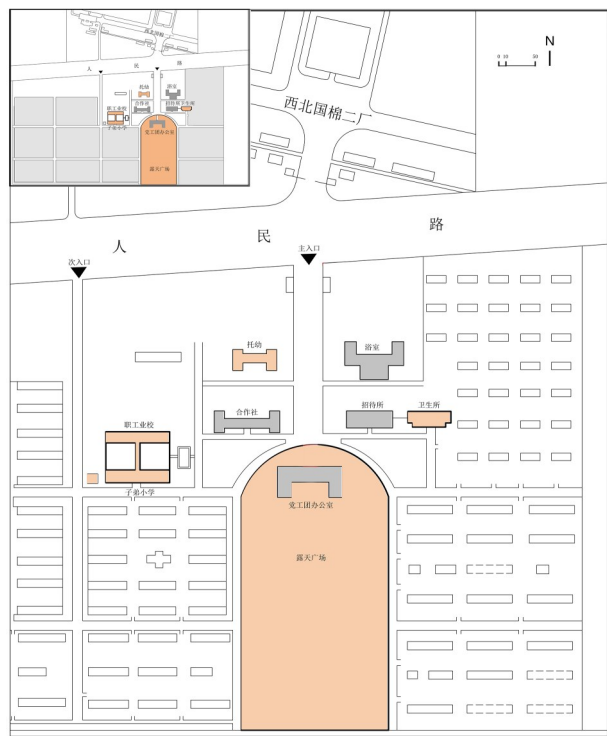


图4 1953年二厂生活区平面布局示意

Fig. 4 Layout plan of Factory No. 2 residential area (1953)

2.2 二厂集体福利设施空间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生产区与生活区均普遍具有封闭性,一般通过实体围墙明确生活区边界,集体福利设施则主要服务于厂区内部职工及其家

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设的众多厂矿单位生活区内,露天开放式广场因具备建设成本低、建造时间短,受场地因素限制少等优势,得到广泛应用。二厂露天广场毗邻党工团办公楼,一方面起到近似“厂前区”的集散功能,同时也作为生活区重要的体育活动场所和职工学校的风雨操场。露天广场平面呈矩形,北段半圆形,其中矩形段长196 m,宽100 m,半圆段半径约50 m,整体尺寸接近400 m跑道。虽然广场建造简易,但在早期生活区中占据重要地位,承办职工和学校的众多集会活动,包括文艺汇演、运动比赛等。这一时期的二厂虽然没有设置礼堂或俱乐部建筑,但其露天广场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早期文体活动的功能,并保留至今(图5)。



图5 二厂露天广场现状

Fig. 5 Current state of Factory No. 2 open-air sports ground

建厂时配建的托儿所和子弟学校承担其生活区的文化教育功能,同时设立的职业学校也对当时开展扫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教育设施主要设在党工团办公楼西侧,与住宅区最近处隔路相望,最远处约350 m,处于步行5 min可达范围内。为方便职工接送子女上下学,托儿所置于生活区靠近主要出入口处。职业学校和子弟小学两者由中间连廊相连,但为避免流线交叉,二者各设有主要出入口。子弟小学主入口设在道路旁,交通便捷,有利于职工接送子女上下学。职业学校则自东侧支路经由一小广场进入。子弟小学占地面积3000 m²,建筑面积941.47 m²,设立6个教学班150余名学生,配备有11名教职工^[19]。在结构上,建筑采用预应力空心楼板、砖框架,并以“干打垒”方式填充墙体,有效降低了建筑成本。承担职工医疗福利设施功能的卫生站位于党工团办公楼东侧,也更靠近生活区北入口,其建筑面积300 m²,设内科、妇产科、西药房与化验室,能够为职工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建筑坐北朝南,整体仅一层,与生活区主要道路以绿化用

地隔开,卫生所的主入口可通过西侧或南侧的道路便捷到达。

二厂生活区及其福利设施规划布局体现出计划经济早期“生产先于生活”的建设思想,整体生活区配置简单清晰,福利设施分布相对集中,且相互借用。福利设施所在区域处于职工上、下班必经的轴线路段,成为生产区和生活区的空间枢纽。

3 样本2:七厂——福利设施区作为生活区的功能核心

“一五计划”是我国工业建设受苏联影响最为突出的时期之一^[20],但其较高的建筑标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难以全面普及,因此除个别重大工程外,二、三线工业城市的一般性工业建设活动投资被大幅削减,以实现成本节约^[14]。而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则进一步强化了生产与生活的紧密结合,这种理念对这一时期生活区的规划布局同样产生显著影响。

3.1 七厂的集体福利设施布局

1958年,纺织工业部根据决定继续扩建咸阳棉纺织厂建设项目,但将生产规模缩小,并命名为西北国棉七厂。七厂生活区同样设置于生产区南侧,地处人民路以南,胜利路以北,占地面积约18.4 hm²,场地东西长约380 m,南北长约510 m。其总平面图清晰反映出生活区的规划设计并未照搬当时盛行的苏联“大街坊式”,而是采用传统平行排列式布局。这是由于一方面早期效仿苏联工人住区规划模式已经在建成实例中初见弊端,东西方向布局无法满足采光通风等品质需求,与此同时,其较高建设标准也进一步迫使在大幅削减预算的情况下,采用最传统、简朴和高效的方式完成。南北和东西交叉主路构成了生活区的规划骨架,南北两端设出入口,用以连通城市主次干道。集体福利设施建筑群集中分布在十字路口附近并沿主路展开,自北向南依次为食堂、职工医院、俱乐部、幼儿园、纺纱厂、招待所及小学。这些福利设施主要服务于厂区内职工或家属,处于十字交叉路口中心的布局表明了其作为生活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地位。七厂中小学校远离中心区域,而设置于生活区南侧,并与城市次干道胜利路相连,从而在资源相对紧缺的“大跃进”时期最大化节约教育资源,服务纺织系统内符合入学条件的职工子弟(图6)。

与计划经济初期分列轴线两侧的布局方式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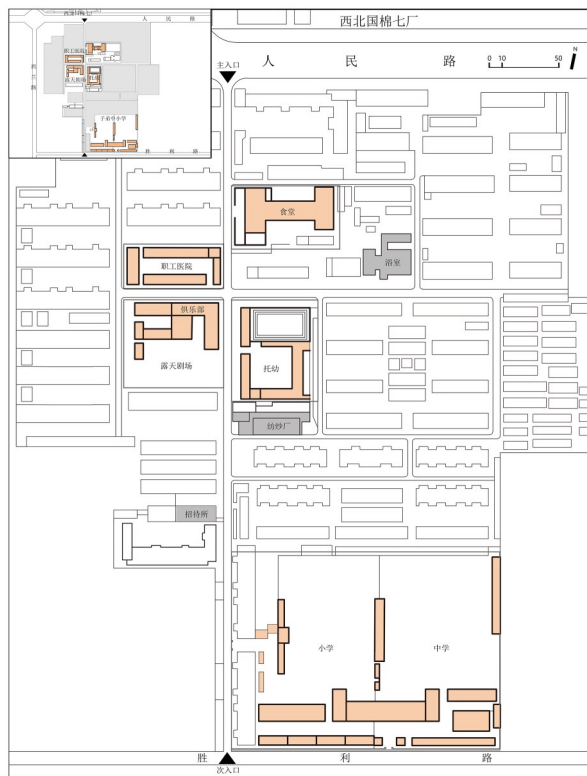


图6 1965年七厂生活区平面布局示意

Fig. 6 Layout plan of Factory No. 7 residential area (1965)

比,这一时期的福利设施布局转向集中布局,并通过彼此的紧密结合建立起生活区公共服务组团。生活区内也不再设置党工团办公楼,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生产区对生活区的影响,与此同时,职工食堂则在生活区中广泛出现。这与“人民公社”运动倡导的家庭生活向集体生活转变,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思想密不可分。此外,生活区内增设小型工厂,便于组织职工家属或老弱病残者共同参加劳动。

3.2 七厂的集体福利设施空间特征

由于七厂在建设时即提出“生活设施砍一半,实现投资二变三”^[21],因此资金缩减主要集中在生活设施领域,特别是职工住宅和宿舍面积仅占原计划建筑面积的46.7%,这也造成其福利设施建筑的规模、形制和物理条件上以追求经济性为主^[21]。俱乐部和露天剧场形成文娱组团,设置于生活区中央,俱乐部功能相对简单,仅设图书室、游艺室,成为职工生活区室内活动场所,同时可用于举办工人会议或作为七·二一大学的教学场地(图7);露天剧场则兼具户外操场和集会功能,其规模和面积与二厂相比都显著减少。托幼群组与露天剧场毗邻,整体建筑坐东朝西,呈现工字形,建筑面积752 m²^[21],

但自建设之初就存在床位不足、设备欠缺的情况,甚至两个孩子只能共用一张床位,1960年再次增建一座砖木结构平房,用以扩充托育空间,建筑面积855.27 m²,建筑前设小广场供幼儿活动。职工食堂总面积则达到1515 m²,呈短工字形,分东、西两个饭厅,但也仅能勉强满足生活区数千人的集体用餐。后期为了缓解职工住房困难这一问题,食堂东饭厅被改造分隔成能提供40户职工居住的宿舍。职工医院位于生活区主要道路西侧,建筑整体由二层住院部、单层门诊室、单层供应室组成,这三部分共同围合出一个庭院,但是庭院内部缺乏绿化。七厂的中小学组团设置在生活区南端,与城市胜利路毗邻,占地面积约2.1 hm²,由教学楼和露天操场共同组成,形成两个院落。中学与小学之间的露天操场由平房分隔,二者互不影响。校园在生活区内部主干道和城市胜利路分别设置两个出入口,便于本厂职工和附近职工子弟出入(图8)。



图7 七厂职工俱乐部室内历史照片

Fig. 7 Interior of workers' club at Factory No.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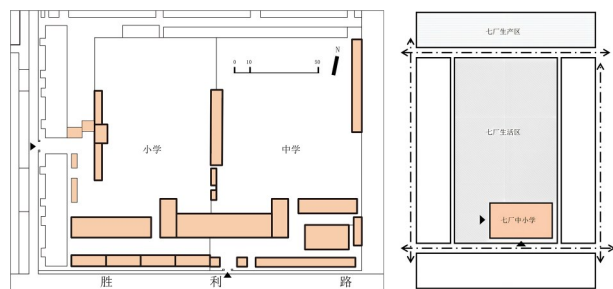


图8 七厂中小学平面布局示意

Fig. 8 Layout plan of Factory No. 7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与计划经济初期相比,“大跃进”时期的生活区建设在投资紧缩的情况下,虽然规模和质量上有所降低,但依然承担了较高负荷的公共服务职能,集体福利设施彼此靠近,共享借用,个别设施(如中小学)设置于生活区边界地段,以便于服务周边人群,福利设施建筑群成为生活区中的核心功能组团。

4 样本3:彩虹厂——福利设施区作为生活区与城市公共服务的接口

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生活区建设以自建自用为主,虽然个别福利设施能够一定程度上接纳或服务周边,但就总体而言仍然体现了较强封闭性。但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四三方案”和改革开放的推进^[22],工业企业建设出现新气象,并影响到了生活区的规划建设。彩虹厂建成于1982年,是我国“六五”期间从日本引进建设和扩建的重点项目,是当时我国生产量最大、配套能力最强的彩色显像管企业。

4.1 彩虹厂生活区的集体福利设施布局

彩虹厂生活区和生产区由城市干道——彩虹路分隔,且开设有多对外出入口,内部道路直接与城市道路衔接,并据此将整个生活区划分为若干生活片区。不同功能福利设施建筑物分散布局且设置于生活区四周,内部则集中布置住宅区。自北向南依次为文娱设施组团、教育设施组团和医疗设施组团,自西向东则依次为食堂、内外来宾招待所、游泳馆、体育馆、文化综合楼与职工俱乐部。上述集体福利设施不再强调集中布置,而是设置于生活区与外部城市道路相连处。生活设施组团由食堂、游泳馆、体育馆、文化综合楼与职工俱乐部组成,其安排和布置考虑了使用便捷性且距离生产区最近,不仅为厂职工及家属提供服务,还可方便内宾招待所、外国技术人员招待所的来宾共同使用。职工医疗组团则规划在生活区南侧,与城市主干道——渭阳西路直接相连(图9),且医院不再仅针对院内职工服务,而是成为面向社会开放的普通医疗设施。

相较计划经济时期的二厂、七厂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兴建的彩虹厂生活区集体福利设施不仅在规模上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布局上从原来的集中设置转向分散布局,从原来深入生活区内部转向生活区四周,并与城市道路相连,规划布局层面反映出其福利设施早期的对内封闭转向对外开放,福利设施组团成为了生活区与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接口。

4.2 彩虹厂生活区的集体福利设施空间特征

彩虹厂生活区福利设施的建筑呈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观简洁素雅无多余装饰,建筑物质量较高且规模较大。俱乐部结构为砖混结构,屋顶为钢屋架承重,建筑面积达3516 m²,整体分为前厅、观众厅、舞台和后台,可容纳观众1640余人。建筑南立面简捷大方,装有大面积方格窗,将光线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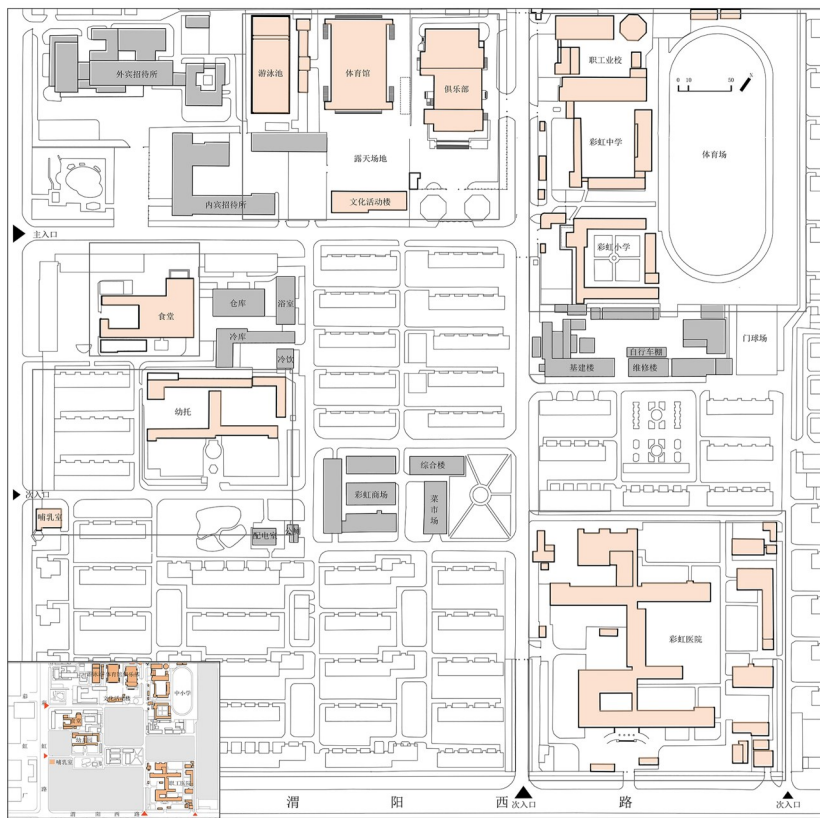


图9 1982年彩虹厂生活区平面布局示意
Fig. 9 Layout plan of CPT Plant residential area (1982)

入室内。侧立面韵律有序,高低错落,前厅部分的墙体装饰有镂空花纹。观众厅体块为坡屋顶,体块短边接前侧的门厅,长边侧立面的构造柱自然凸出而成为装饰,顶部开有小窗。舞台部分墙体被构造柱纵向分割,体块明显高出前方的观众厅和前厅(图10)。文化综合楼为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建筑面积 2700 m^2 ^[23],内设图书馆、阅览室、棋艺厅等室内活动场所;室内体育馆采用轻钢网架结构屋顶,可容纳1500人同时观赛(图11);露天泳池则设置 $50\text{ m}\times 25\text{ m}$ 标准比赛池和 $25\text{ m}\times 15\text{ m}$ 嬉水池。体育福利设施不仅满足职工和附近居民使用,同时也能承办一些社会团队、省部级的体育赛事活动。职工医院为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西侧、北侧、东侧又为生活区开设次入口。医院建筑面积 13898 m^2 ,主楼 9200 m^2 ,共3层,整体为混合式布局。医院自南向北依次为门诊部、治疗部与病房,连廊将主要的东西向建筑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围合出庭院。门诊楼主入口由柱子撑起雨棚,形成过渡的灰空间,上部通高的绿色玻璃幕墙创造视觉焦点,又被线性元素分割,增强了虚实对比,建筑顶部檐口凸出(图12)。主入口西侧为急诊中心,仅1层。可以从

平面图看出彩虹厂职工医院内被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公共空间比例提升,庭院内部有假山、休息座椅,极大丰富了医院的自然环境。医院建设之初其科室配置已较为齐全,除了服务本厂职工外,还兼具为周围生活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

与样本1、2相比,彩虹厂生活区的集体福利设施在规模、质量上均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建筑的功能与规模配置不仅满足本院职工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服务周边城市居民的可能。这与其规划布局方面所体现的特征相辅相成,客观上促进了企业兴建的福利设施从对内封闭走向对外开放,并在城市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5 生活区福利设施样本发展演变特征

5.1 从集中布局到分散组团、从封闭自用到开放共享

建成于1953年的二厂、建成于1957年的七厂、以及建成于1982年的陕西彩虹厂,其生活区的3个样本清晰呈现了集体福利设施在规划布局上的演变过程(图13)。50年代计划经济初期的福利设施规划于生产区与生活区的交界处,一方面为生活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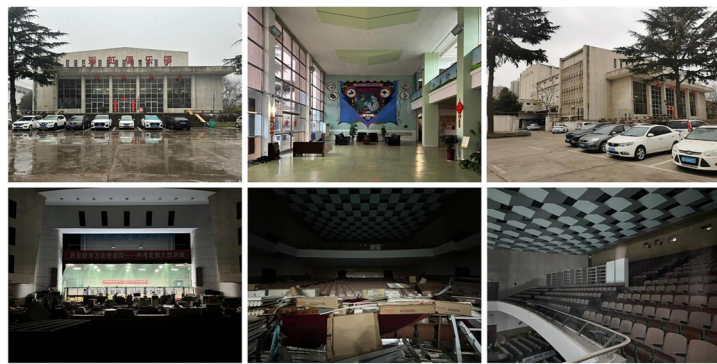


图 10 彩虹厂职工俱乐部现状

Fig. 10 Current state of workers' club at CPT Pl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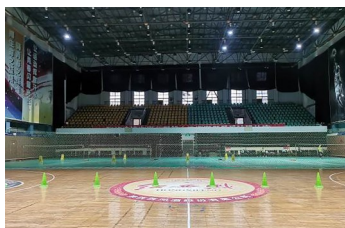


图 11 彩虹厂室内体育馆现状

Fig. 11 Current state of stadium at CPT Plant



图 12 彩虹厂职工医院立面

Fig. 12 Facade of hospital at CPT Plant

的基本福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保障,同时也作为生产区向生活区的延伸,体现了“生产优先生活”的时代特征;而 50 年代末期和 60 年代正值“企业办社会”的高潮时期,生活区的福利设施空间则主要以集中的功能组团方式分布,类型显著增加的同时凸显了对内服务、封闭自用的特征;到改革开放时期,生活区受到工矿企业市场化转型的影响,其生活区中的福利设施开始逐渐与城市公共服务接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企业与社会交流互动的窗口,体现出开放共享的特征。同时,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福利设施建筑种类日益丰富,反映了福利设施从单一生活保障向多元服务体验转变的趋势。福利设施建筑从计划经济初期建造简易的单层建筑逐渐发展为多层建筑,建筑质量和外观设计显著提升,设计重点也从以实用性为主朝功能性、美观性转变(表 1)。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建筑技术的发展,更体现企业对职工福利的日趋重视。

5.2 从服务企业到服务社会、从福利设施到公共配套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化建设与工业化进程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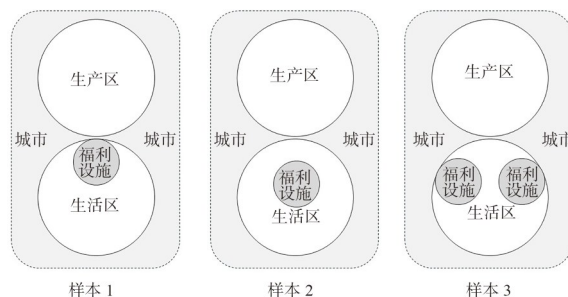


图 13 3 个样本生活区福利设施布局关系演变示意

Fig. 1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facilities layout relationships in three sample residential areas

不可分,这在二、三线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发展体现得尤其突出:其城市公共服务高度依赖传统工矿企业生活区所配建集体福利设施,工矿企业全面负责职工的生产与生活:职工“足不出厂”,其休闲、文体、教育、康养等一系列活动几乎都能在其生活区完成。但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办社会”所带来的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也为工矿企业带来沉重负担。2002 年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意见》,明确提出“企业管理中小学校的职能移交当地政府;符合当地区域卫生规划的企业自办医院,既可从企业分离出来实行产业化经营,也可按照自愿的原则,由企业当地政府协商移交;企业自办的后勤服务等机构要尽快由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转为有偿服务,由单纯为企业服务转为面向社会服务。“企业办社会”的建设思想逐渐退出历史,而基于现代公共居住小区的理论日益完善。但从居住区规划配套建设的要求中不难看出早期工业生活区福利设施所积累的经验和影响,例如要求内有较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如影剧院、百货商店、医院等^[24]。在 1980 年的《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中进一步规定了居住区级、小区级的配套公共建筑

表 1 3 个样本单位集体福利设施建设概况
Table 1 Overview of welfare facilities in three sample residential areas

生活区	建设时间	建设内容	建筑指标					建筑特征
			建筑面积/ m ²	建筑 层数	建筑高 度/m	建筑结构		
二厂	计划经济初期	生活类 露天广场	23000	—	—	—	—	露天建造
		教育类 子弟小学	941	1	4	砖框架	—	干打垒方式建造,建造简易
		教育类 职业学校	998	1	4	砖框架	—	
		托幼	485	1	4	砖框架	—	
		医疗类 卫生站	300	1	4	砖框架	—	
七厂	“大跃进”时期	露天剧院	1200	—	—	—	—	露天建造
		生活类 职工俱乐部	554	1	4	砖框架	—	与露天剧院形成组合关系
		职工食堂	1515	1	4	砖框架	—	分为东西两饭厅
		教育类 子弟小学	991	1	4	砖框架	—	院落围合
		教育类 职业学校	—	—	—	砖框架	—	无固定场所
		托幼	855	1	4	砖框架	—	院落围合
		医疗类 职工医院	1592	2	8	砖框架	—	院落围合
彩虹厂	改革开放初期	职工俱乐部	3516	2	27	砖混钢屋架	—	现代主义风格,侧立面镂空纹饰
		体育馆	3600	2	24	砖混钢网架	—	现代主义风格,功能流线明晰,
		生活类 游泳馆	2073	1	3	砖混	—	露天泳池,服务空间为单层,无特殊标识
		文化综合楼	2700	4	—	钢混框架	—	无特殊标识
		职工食堂	1609	1	4	钢混框架	—	强调主入口,设山花雨棚及立柱
		子弟中小学	12933	4	16	钢混框架	—	院落围合,教学楼宇之间连廊相连
		教育类 职工业校	3900	4	16	钢混框架	—	八角楼建筑成为特点,内设阶梯教室
		托幼	4842	3	12	钢混框架	—	院落围合
		医疗类 职工医院	13898	3	11.7	钢混框架	—	强调主入口设计景观丰富

指标,包含如中小学、幼儿园、邮政所、运动场、百货商店、餐饮副食店等,其中针对4万~5万人的工矿区另要求补充招待所、综合食品厂、消防站等设施,成为今天居住区和生活圈配套设施的早期雏形。

将3个样本与当下居住区配置相比不难看出,传统意义上的福利设施已经被今天的居住区公共配套所取代,功能内容更加多元丰富。而传统单位生活区随着市场化发展,也在逐步实现自我更新。例如七厂拆除了生活区食堂及俱乐部,调整为社区广场,彩虹厂将原文化综合楼改为培训楼等。而在各生活区的居住部分,则见缝插针补充如小型商业、派出所、停车场等设施,以满足当下居民使用需求。

6 保护更新利用建议

单位集体福利设施承载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社会关系网络,其保护需兼顾历史价值存续与现代功能再生。二厂、七厂与彩虹厂的样本历时性研究证明,通过价值分层实现精准干预、通过记忆转译构建文化认同、通过机制创新保障可持续性,可

使这些建筑遗存转型为兼具历史厚度与社区温度的新型公共空间,为工业遗产活化提供可复制的范式。

1) 价值分层保护与功能再生。

根据建筑的历史价值、空间质量与社会关联性,建立动态保护框架。对二厂党工团办公楼、彩虹厂俱乐部等具有较高价值、能够代表特定历史时期风貌的建筑遗存,宜采用“原真性保护+公共功能植入”模式:保留红砖立面、标语墙等历史符号,内部改造为工业记忆展馆或社区文化中心,通过展陈设计、口述史记录再现集体生活场景。对于七厂食堂、二厂卫生站等建筑风格并不突出,但空间利用价值较好的建筑遗存,宜采用“结构保留+功能升级”策略,将食堂转化为社区共享厨房,卫生站升级为智慧医疗站,既延续服务属性,又提升设施效能。而对其他历史价值较低且质量较差的房屋建筑则通过拆除腾退释放空间,建设社区花园、健身广场等公共设施,弥补现代社区功能短板。

2) 记忆载体转译与空间叙事重构。

工业集体福利设施的保护需从物质空间延伸

到文化记忆层面。针对样本案例,建议采用“符号提取—场景再生—数字延续”三重路径:提取纺织厂、显像管厂等工业符号,转化为景观雕塑、导视标志等叙事元素,串联厂区空间形成记忆走廊;在露天广场等关键性公共节点,利用AR技术叠加历史影像与声效,复原职工集会、露天电影等场景,增强空间体验的沉浸感,实现记忆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

3)多元共治机制与可持续运营。

构建政府、企业、社区三方协作机制。政府层面明确保护等级与功能转换规则,对提供社区化更新、开展在地服务的改造项目应考虑给予容积率奖励;企业层面可探索“产权置换”模式,获得修缮资金的同时,约束文旅运营方使其保留工业文化展示功能;社区层面成立“居民议事会”,组织原职工参与改造方案讨论,在七厂食堂改造中保留饭票结算仪式、在卫生站更新中增设“工龄档案墙”,使空间更新成为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过程。

7 结束语

在城市更新走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单位社会”的碎片化依旧清晰可见,单位集体福利设施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部分功能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面临废弃拆除或者更新改造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抉择,这一现象在二、三线老工业城市中尤为明显。事实上,单位生活区的空间形成及结构特点,映射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单位统筹生产与生活的结果,更是我国“企业办社会”时期的重要物质见证,是工业遗产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片段。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生活区难以满足今天高品质居住区标准,但其具有改造和优化潜力的建筑遗存仍有机会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继续发光发热。

聚焦集体福利设施建筑空间,不仅映射出时代的变迁,也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如何在保留其历史价值的同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进而更好地融入并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存量更新时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全面兴起的大背景下,对集体福利设施空间的深入探索有助于为老旧单位生活区更新与城市空间发展重新提供思考和启发,从而为丰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精细化城市更新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李浩. 历史视角的城市规划实施问题探讨:以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为例[J]. 城市规划, 2017, 41(4):55-61.

- [2] 咸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开征求《咸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意见建议的公告[EB/OL]. [2024-05-14]. http://www.xianyang.gov.cn/zmhd/yjzj/202303/t20230315_1607754.html.
- [3] 王乐. 单位大院的形态演变模式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10.
- [4] 柴彦威,肖作鹏,刘天宝,等. 中国城市的单位透视[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张艳,柴彦威,周千钧. 中国城市单位大院的空间性及其变化:北京京棉二厂的案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5):20-27.
- [6] 连晓刚. 单位大院:近当代北京居住空间演变[D]. 北京:清华大学, 2015.
- [7] 李晨,韩冬青. 单位大院集中地段空间形态的演变:以南昌八一广场周边地段为例[J]. 城市问题, 2011(6):30-36.
- [8] 杨江华. 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单位制生活区建设:路径模式与制度框架[J]. 人文杂志, 2015(10):104-110.
- [9] 吕飞,王悦. 企业型单位大院生活区更新策略初探[J]. 规划师, 2020, 36(18):83-88.
- [10] 房辉,胡靓,罗琳,等. 基于开放共享的典型单位住区福利设施演变与更新探析[J]. 城市建筑, 2023, 20(13):19-22.
- [11] ASHWORTH W. British industrial villag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1, 3(3):378-387.
- [12] 刘伯英,孟璠磊,刘小慧. 工业遗产视角下公司镇的发展与启示[J]. 中国名城, 2023, 37(10):55-60.
- [13] 天津碱厂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碱厂志(1917—1992)[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 [14] BRAY 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unit: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Chinese Cities[G]// CHAI Y W, ZHANG C, HE H G, et al. Trans. Nanjing: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J]. 江西政报, 1953(1):55-59.
- [16] 王永玺,何布峰,曹延平. 简明中国工会史(1925—2005)[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
- [17] 国务院. 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6(25):577-582.
- [18] 柴彦威. 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J]. 地理研究, 1996(1):30-38.
- [19] 国营西北第二棉纺织厂厂志编纂办公室. 国营西北第二棉纺织厂志(1951—1985)[Z]. 咸阳:国营西北第二棉纺织厂, 1989.
- [20] 李百浩,彭秀涛,黄立. 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4):84-92.
- [21] 国营西北第七棉纺织厂厂志编纂办公室. 国营西北第七棉纺织厂志(1958—1985)[Z]. 咸阳:国营西北第七棉纺织厂, 1989.
- [22] 孟璠磊. 工业遗产视角下的新中国“四三方案”工业引进计划追溯[J]. 工业建筑, 2018, 48(8):32-37.
- [23] 中国彩虹编委会. 中国彩虹·彩虹志[Z]. 咸阳: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 1992.
- [24] 赵冠谦,开彦. 艰难的历程 丰硕的成就:新中国住宅建设50年[J]. 建筑学报, 1999(12):35-39.